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

——张国焘问题研究之三

马 建 离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是他在该苏区任职时所犯诸多错误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从五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当敌人加紧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时,他错误估量了敌我形势,盲目轻敌,认可和支持了荒谬的“偏师”说,种下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当敌军即将开始“围剿”时,他错误认为,只要攻克敌之据点麻城,便可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强令红军两次围攻麻城,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也贻误了红军准备反“围剿”的时间;当敌人向苏区腹地进攻时,他急令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正面堵击,与敌硬拼,犯了拼命主义错误;当敌人不断缩小包围圈,苏区首府、重镇和中心区域沦入敌手之后,他惊慌失措,急率红军主力撤出苏区,无具体目标的盲目西进,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当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之后,他在思想上再无重回鄂豫皖苏区的打算,严重违背了黄柴畈会议的精神,致使鄂豫皖苏区的绝大部分丧失。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任职期间(1931年4月至1932年10月),曾犯过许多错误。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肃反中的错误;二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错误。关于前者,我已发表专文论及;现再就后者,作些探讨,供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者和党史工作者参考。

鄂豫皖苏区军民,在该区党、政、军组织的领导下,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5月,利用敌人统治发生危机的有利形势,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的计划。把鄂豫皖苏区的发展推向了“极盛时期”,使之成了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鄂豫皖苏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横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南濒长江中游,北傍淮河,东接江淮平原,西达京汉铁路,大别山脉雄峙中央,地势险要,物产丰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并且,南与中央苏区隔江相望,西与湘鄂西苏区接连,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块苏区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南断长江,西控京汉,威逼武汉,震惊南京”的形势。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把它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国民党反动派继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之后,又策划和部署了第四次“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围剿”有许多特点: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坐镇汉口指挥;把鄂豫皖苏区作为“围剿”的重点;动用了较多的嫡系精锐部队,并且“指挥统一”;投入的兵力多,“围剿”规模大,共使用了26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实行了新的战术。过去是分兵“进剿”、长驱直入。这次则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具体作法是:“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进攻,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网开一面,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边;第二步,实行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①;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手段,达到消灭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的目的。这表明,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但是,纵观全局,对鄂豫皖苏区军民来讲,除以上不利因素外,还有很多有利条件。这就是:红四方面军经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对国民党“围剿”作战的经验,队伍发展壮大,枪械弹药充足,指战员斗志旺盛;随着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鄂豫皖苏区扩大到26个县,部队作战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人口增至350万,红军有了更多的群众作为后盾;地方武装迅速发展,成为红军作战的一支后备军和配合力量,也使红军有了可靠的补充来源;国民党“围剿”军,屡遭红军沉重打击,其官兵心有余悸,害怕与红军作战。因此,鄂豫皖苏区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如果能够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冷静、客观和全面地分析敌我形势,扎扎实实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鄂豫皖苏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反“围剿”,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并未变成现实。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最终还是失败了。

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情况极为复杂。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本文专就主观方面的原因,作些探讨。从主观原因来讲,最根本的是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犯了一系列错误造成的。

二

张国焘的第一个错误是,主观地看待形势,错误地估量敌我力量对比,盲目轻敌,支持荒谬的“偏师”说,种下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

正确地分析形势,实事求是地估量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是制定战略方针的重要依据,也是克敌制胜的基本要求。毛泽东等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因此,在当时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仍能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在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从而制定出作战方针,指挥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作为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似乎不懂得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他只知道唯上、唯书,完

全无视鄂豫皖苏区的客观实际情况，喋喋不休地复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关于敌我力量对比分析的错误观点，并且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左”倾观点。

“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张国焘却否认这一特点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1932年1月10日，他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②在这个轻敌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鄂豫皖省委于1932年2月17日作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偏师”说，认为自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以后，已经再没有力量独立地“围剿”鄂豫皖苏区及红军了，“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只能担任偏师的任务”了。这种“偏师”说是沈泽民（鄂豫皖省委书记）首先提出来的，张国焘没有反对，而是认可，并给予支持。他把当时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的军队，占据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国民党反动派，只看作“偏师”，是非常荒谬的。甚至连“左”得出奇的当时的中共中央，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③，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若说在进攻鄂豫皖苏区中帝国主义军队已经是主力，而国民党军队是偏师是绝对错误的。”^④中共中央的批评，没有引起张国焘等人的重视和反思。当红四方面军获得苏家埠大捷后，张国焘的轻敌思想逐渐上升，认为红军“基本上冲破四次‘围剿’以鄂豫皖为中心的新计划。”^⑤

鉴于这种情况，1932年6月5日，临时中央在发出的《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中明确提醒说：“敌人对进攻苏区的计划已有了新的布置，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围’总指挥”，敌“目前利用全力向湘鄂西苏区进攻，预备击破这一方后，转向红四军后方进攻。”很明显，这个军事训令，一方面是要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估计，另一方面提醒张国焘，敌人新的“围剿”已经开始布置，鄂豫皖苏区军民要做好反“围剿”的准备。

但是，张国焘哪里听得进临时中央的指示。他不仅未认真贯彻落实，并且随着豫南战役的胜利，头脑更加发热，6月19日致电临时中央说：“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提出红四方面军当前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使红军主力进逼罗山，破坏京汉铁路，歼灭敌人重兵；第二步，沿京汉铁路南下，威逼武汉。在这个计划中只字未提反“围剿”准备的问题。

根据张国焘的指导思想，6月19日，陈昌浩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虽然在报告中，他也讲到反“围剿”的问题，却没有讲如何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报告的重点是沿着张国焘对形势分析的错误思路来看待敌我力量的对比。他认为：“国民党军队一天天的缩小，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经占了优势。”“目前我们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人‘围剿’一个打击的问题，而是根本消灭‘围剿’，争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⑥；又说：“过去是敌人包围我们，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⑦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及“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客观规律。因此，张国焘等人想的、做的、宣传的是如何“去包围敌人，彻底消灭国民党统治”，而不是认真考虑如何反对敌人新的“围剿”的问题。这就“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⑧。

三

张国焘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红军进行必要的休整，冒然作出红军攻打麻城的决定，贻

误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大好时机。

对形势的错误估量,必然导致策略上的错误。由于张国焘等人认为革命的形势已由“敌强我弱”变成了“我强敌弱”,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加鼓吹实行“进攻策略”,说什么“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等。

自从红四方面军投入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计划的军事行动以来,已连续作战7、8个月,部队已十分疲劳,亟待休整。但张国焘置实际情况于不顾,命令红军西出平汉线,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然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由于张国焘是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于他的命令,红四方面军只得勉强执行,其结果收效甚微,仅攻克鸡公山,歼敌一个团。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已频频向平汉线的信阳至武汉一带调动,新的“围剿”开始在即。鉴于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向鄂豫皖中央分局建议,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同时,令部队东返。当红军东返行军至夏店时,张国焘和沈泽民从后方赶来。为解决红军如何行动问题,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史称夏店会议。会上,徐向前再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自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⑧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敌人的“围剿”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仅在鄂豫皖苏区边缘地带构筑工事,作些小规模、侦察性的进攻;如果按照徐总指挥的意见办,立即转入反“围剿”的准备,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沈泽民却竭力反对这一正确意见。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因此,他提出红军应“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⑨徐向前据理驳斥了沈泽民的错误意见。但由于沈的意见与张国焘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得到了张国焘的支持。会议最后按张、沈的意见作出决定:红军“南下进攻麻城”。

麻城是敌人插入鄂豫皖苏区内的一个顽固堡垒。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围剿”军死守麻城,其战略意图是:只要守住麻城,既可以牵制红军主力,又可以使其军队东西相援,配合中路和右路两军作战。中央分局作出红军“围攻麻城”的决定,正中蒋介石的预设圈套。

夏店会议后,红四军主力向麻城地区开进。当时的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军主力部队以神速的动作,抵达麻城地区。红军的作战意图是:首先扫清麻城敌人的外围据点,切断其与宋埠、歧亭、黄陂的交通线,孤立和围困麻城;继而开展“围城打援”,攻打黄陂、武汉方向的援敌;最后拔掉敌人占领的据点麻城。

根据这个作战意图,红军“首先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脑、邓家竹园等地,并于红石堰、七里桥一带全歼敌三十一师九十三旅”,“进而以主力控制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至红石咀一带高地,围住驻城西南中馆驿的敌三十师九十二旅,切断了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的交通线”。同时,红军“还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配合,将麻城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地主民团一扫而光”,麻城随之陷入红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红军第一步计划实现之后,即转入准备实施“围城打援”。但是,负责麻城地区作战的敌最高指挥官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非常狡猾。他一方面命令麻城之敌凭固坚守不出,免被红军聚歼;另一方面,调驻黄陂的三十一师,经宋埠绕道北泉增援,避开了红军打援的战场,使红军打援未能得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敌人行动的变化,决定放弃打援计划,率主力乘虚南出黄陂。红十二师一举攻占仓子埠,前锋进逼黄陂,武汉之敌为之震惊,忙调驻武汉的军队向北堵击;又令麻城、宋埠之敌军向西南出击,妄图夹击红军。红军调头迎击敌三十

师和三十一师于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经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多旅，余敌溃退回宋埠和歧亭等据点。红军主力部队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复转再次围攻麻城。麻城敌军即收缩外围据点，守城待援。红军既不能迅速攻克，又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旷日持久的围城，既消耗、疲惫了红军，又使红军丧失了准备反“围剿”斗争的大好时机。

四

张国焘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诱敌深入，同敌军正面硬拼，使已经被动的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正当红军主力在麻城地区与南线之敌呈相持状态之时，东线、北线、西线之敌则对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东线皖西之敌徐庭瑤部向驻霍丘城的红二十五军发动进攻。由于张国焘曾指示红二十五军“要守住霍丘城”^②，该军指战员也只好照办，固守城池，与敌人决一死战。但由于寡不敌众，绝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霍丘城被敌占领。霍丘的失陷，完全是张国焘的错误指导方针造成的。

敌在霍丘得手后，随移师东向；八月上旬，北线之敌主力陈继承纵队，出广水，向鄂豫皖苏区的腹地七里坪开进；西线之敌主力卫立煌纵队，由花园向河口开进。另外，敌军还在靠平汉线东侧布置马鸿逵部，在豫南布署张钫纵队，妄图对红军实行“分进合击”。

由于红军主力仍在围攻麻城，各路敌军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区域后，未遭红军的有力抗击。蒋介石见此情形，“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命令国民党“围剿”军主攻纵队迅速插入苏区中心区域，寻找红军主力决战。8月10日，敌军陈继承纵队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纵队由河口扑向黄安。这时，张国焘发现情况严重，才不得不停止对麻城的围攻。

红军面对来势汹汹的各路之敌怎么办？这是决定红军成败的关键。军事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若遇强敌，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就是说，红军在强敌面前，必须首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可以避免过早与敌人决战，便于有效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也可以在运动中发现敌人的弱点，并及时集结红军兵力，选择有利歼敌的战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张国焘没有这样做，而是不顾红军长期与敌作战的疲惫，命令红军主力仓猝回师苏区迎击进犯之敌军。他认为只要迎头痛击敌人，就能一举粉碎“围剿”。鉴于此，红军主力撤麻城之围后，红十一、十二、七十三师急进河口迎击敌军卫立煌纵队；红十师开赴七里坪堵击陈继承纵队。8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红十二师在黄安西的冯寿二同敌十师遭遇，战斗十分激烈。红十一师、七十三师赶到后立即投入战斗。与敌军反复冲杀和肉搏，迫敌后退。敌其它各师见十师受挫，便据地固守，与红军形成相峙状态。随后，陈继承纵队由宣化店向七里坪开进，红军后路有被敌抄击的危险。因此，红军决定撤出冯寿二地区，转向七里坪。

但是，张国焘并未从冯寿二这场恶战中吸取教训，改变战略战术。他率领红军主力从冯寿二转向七里坪，并不是为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企图会同红十师，守卫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城镇七里坪。当红军主力赶赴七里坪时，敌陈继承部已占领了倒水河以西各重要据点。此时，张国焘本应审时度势，改变战略战术，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倒水河东岸布阵，拉开了堵击敌人、与敌硬拼的架势。8月15日拂晓，敌军全线出动，向红军阵地猛攻，部分敌军渡过了倒水河。红军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血战，将已过倒水河的敌军又赶回倒水河西岸，并歼敌一

部。但是,红军未能全歼敌之一路,整个战局也未发生有利红军的重大变化。相反,红军却遭到重大伤亡和消耗,继续处于被动地位。再者,敌军二师虽遭重创,但敌三师和八十师又迅速补上,卫立煌纵队亦由南向北进逼七里坪。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若再同数倍于自己的两路纵队敌军硬拼,其处境将会比冯寿二战役中遇到的情况更为危险。因此,决定红军撤出战斗。除留红十师置于檀树岗阻击敌人外,主力红军撤至晏家河一带。

敌军占领七里坪后,作了新的战略部署。卫立煌纵队自七里坪北上,追击红军;陈继承纵队绕道宣化店集结,再东经光山县陡沙河,从西侧进攻;张钫纵队在北面堵截。敌三个纵队企图合围红军,攻占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这时,张国焘对敌军的情况判断又出现了错误。本来,敌陈纵队是为避遭红军在檀树岗一带侧击,才改绕宣化店,经陡沙河与敌张钫纵队靠拢的,而张国焘却误认为陈纵队是溃逃,便作出了打击与陈继承纵队靠拢的张钫纵队、保卫新集的错误决定。因为这样做,不仅未能使红军避开敌之主力,实施有效的机动作战,相反的,恰恰适应了敌人的战役企图。

正当张国焘命令红军作进攻敌张钫纵队的部署之时,敌陈纵队已从西面赶来。这就迫使张国焘不得不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只好命令红军在胡山寨一带堵击陈纵队。红军与敌军激战5天,虽歼敌2000余人,却未能击退敌军。而南面之敌卫立煌纵队,北面的张钫纵队,则步步进逼,对红军形成了三面合围之势。这时,张国焘才决定红军主力撤离胡山寨地区向皖西转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等党政机关也随同红军一起撤出新集。9月9日,鄂豫皖苏区的首府新集陷入敌手。至此,张国焘正面堵击敌人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使已经被动的红军更加被动。后来,徐向前回顾这段对敌作战历史时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作战指导思想上来看,一是对敌军的战斗力和‘围剿’战术的改变估计不足;二是初战时机选择不当,仓促击敌,过早与敌主力决战;三是没有实行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方针,未能在局部上形成优势”^③。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五

张国焘的第四个错误是,当红军主力反“围剿”连连失利之后,他便由盲目轻敌转为悲观失望、惊慌失措,几乎把红军拖向了绝境。

张国焘的堵击方针破产后,并没有从中得到教训,采取得力措施挽救失利、被动的战局。相反的,他却由盲目轻敌、狂妄自大一变而为惊慌失措,悲观失望,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说什么“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④。这时的张国焘已被敌人的凌厉攻势吓破了胆。他认为,单靠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已经无法取得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的胜利。因此,他一方面,两次致电党中央,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⑤;另一方面,率师东进,希望到皖西地区寻找出路。可是,当红军主力抵金家寨时,敌徐庭瑶纵队已先红军行动,越过淠河、独山一线,敌卫立煌、陈继承两个纵队也从沙窝、新店方向追来,形成了对红军东西夹击之势。红军又决定南下英山,寻机歼敌。当红军南下途径燕子河时,得知英山已被敌占领,形势非常严峻。此时,张国焘已六神无主,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燕子河会议上,他时而主张“南下取英山”,时而提出“出潜太打游击”,与会者否定了“出潜太的计划”。会议最后决定,红军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当红军直下英山,拟打击敌上官云相纵队时,敌却依托防御

工事，坚守不出。红军无隙可乘，只好移师东进，由英山以西的石桥铺向黄麻地区行动。敌很快得知红军这一作战意图，立即命令卫立煌、陈继承两纵队穷追不舍；同时，西线之敌也由平汉铁路一线向黄安、麻城方向堵击。当红军开抵河口地区时，与敌军遭遇激战，歼敌一部后，便立即急向黄柴畈转移。红军抵达黄柴畈的当天，敌军陈继承纵队先头部队尾随追到，当即作出对红军合围的新部署。这就是：“以陈纵队和十三师密布于河口镇以东至华家河一线，准备从南面和东面向红军进攻；马鸿逵纵队由平汉路东侧南下，向四姑墩方向进逼；敌一师，八十八师也从河口镇向北推进。”^⑦这样，就将红军包围在方圆仅几十里的范围之内。此时，红军四面临敌，“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六

张国焘的第五个错误是，违背黄柴畈会议精神，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一去不复返，致使鄂豫皖广大军民经长期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

当红军处于四面临敌的极为危险的境地时，红军下一步怎么办？这是急待而且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红军跳出根据地打，待机歼敌后再返回；另一种是主张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分散游击。”张国焘持前一种意见。他认为：“反第四次‘围剿’中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的主要城镇被敌人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如果将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根据地进行战斗，是毫无希望的。”沈泽民则持后一种意见，他反对张国焘的观点，认为“反四次‘围剿’，我军未能击退敌人，处于被动和失败的地位，是客观事实。但是，红军不应脱离根据地。在敌人重点深入根据地的情势下，可采取分散游击，坚持游击战争，待机破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由张国焘根据与会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红军主力“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⑧根据这个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0月12日夜，从四姑墩出发，越过京汉路，转移至外线。对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铁路以西转移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不能说是逃跑。因为红军当时继续在内线作战，不仅已无取胜的可能，并有被敌围歼的危险。为了摆脱这种险境，将红军主力转移至外线，这是符合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保存红军的实力，在运动中待机破敌的作战原则的。这是以徐向前总指挥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想法，这种想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但是，在思想深处，张国焘与徐向前总指挥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挥员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实际上，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上他玩了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在黄柴畈会议上振振有词、信誓旦旦，一再表示，“为了保卫苏区，他要把部队带到苏区外围打击和消灭敌人；他发誓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曾参加黄柴畈会议的成仿吾后来回忆说，张国焘在会上发誓的模样“我至今仍记得十分真切”，他大声说：“我发誓、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⑨另一方面，就在他发誓之前，就已萌生了离开鄂豫皖苏区的思想。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期就这样说过：“鄂豫皖地处平汉、津浦两路之中，滨大江之侧，为敌人必争之地。帝国主义要争，国民党要争，不如四川天府之国，可以立为根据地”^⑩。当红

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的第二天,即10月13日,张国焘便派人侦察去潼关的路线,企图往潼关方向逃去,由于徐向前等人的反对而未果^⑨。在红四方面军到达湖北鲍家店,总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以后的行动方针时,与会者多数主张红四方面军挥师南下,同数天前在附近经过的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以便集中红军力量,歼灭和打击敌人,等待时机,再打回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个建议,仍然决定继续西去^⑩。这样做,充分表现出了张国焘的逃跑思想,完全违背了黄柴畈会议的精神。由于红四方面军主力“一去不再复返”,经过鄂豫皖苏区广大军民长期奋斗开创和建设起来的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根据地的绝大部分被敌人占领了。

以上情况表明,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不容推卸的主要责任,任何企图为张国焘罪责开脱之词都是错误的。但是,也应该指出,造成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把这次反“围剿”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张国焘。我认为,只有这样看待问题,才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

注 释:

- ①⑨⑩⑪⑬⑭⑯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194、195、195、204—205、209、210—211页。
- ② 转引自《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载《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81页。
- ③④ 《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2年3月6日)
- ⑤ 《红四方面军给中央转全国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信》(1932年5月8日)
- ⑥⑦ 《鄂豫皖中央分局(陈昌浩)向新集市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联席会议的报告》(1932年6月19日)
-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 ⑫ 李华丰等:《霍丘城血战记》,载皖西革命斗争史编写组编《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
- ⑭ 转引自《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
- ⑮ 参见《中央局转发鄂豫皖分局请中央令各区红军配合反“围剿”电》(中央局1932年9月13日转)、《中央局转发鄂豫皖分局再请各红军配合反“围剿”电》(中央局1932年9月24日转)。
- ⑰ 转引自红安县革命史编辑委员会编《红安县革命史汇编》中册,1960年1月。
- ⑱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49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